

试论玉剑璏的时空格局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Jade Scabbard Slide

梁 壮

Liang Zhuang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83)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内容提要：玉剑璏是春秋晚期至魏晋时期贵族佩剑剑鞘上的一种玉饰，本文搜集了国内271处遗址出土的346件玉剑璏，通过型式分析，将其形态分为五型，又据其顶面装饰特点将纹饰归为七类。综合考虑各时期玉剑璏的形态与纹饰特征，将其划分为萌芽、发展、兴盛、衰落和消亡五个发展阶段。因这批材料具有相对明确的出土位置信息，进而勾勒出玉剑璏在春秋晚期的中原地区出现后迅速传播，两汉时广泛见于各地高等级墓葬，魏晋时期集中于南方长江一线的时空分布特征。

关键词：玉剑璏 时空分布 出土文物 玉器

Abstract: The jade scabbard slide is a kind of jade ornament on the scabbard of noble swords from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paper collected 346 jade scabbard slide excavated from 271 sites in China, and divided their forms into five types through type analysis, and grouped the ornaments into seven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top decoration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ing the forms and deco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it is divided into five development stages: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prosperity, decline and extinction. Since they have relatively clear excavation location information, this paper is able to outline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jade sword scabbard, which appear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n spread rapidly, was widely seen in high-grade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and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area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Jade scabbard slid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unearthed relics; jade

在中国古代的玉器中，装于剑鞘上的玉剑璏是一类形制特殊的器物，其整体呈长条状，背部有一长方形穿孔用以穿系革带，顶面则多有阴刻或浮雕纹

饰。关于这类器物的名称，已有璏、璊、珥、琫、剑鼻、昭文带等多种称谓；关于这类器物的功用，至迟至宋代，便已不明。北宋吕大临《考古图》著录一件赤色玉璏，根据蜀张恶子庙中唐僖宗所赐玉具装剑上的玉质剑鼻，认为这种玉器应置于剑室上下

“双缀以管绶”^[1]；清代吴大澂《古玉图考》著录玉璫8件，据吴氏考证，“此玉当佩于腰间，专为系组而设”^[2]。直至1925年，日本考古学家在朝鲜汉乐浪郡遗址的古墓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此类器物，出土时嵌于漆木剑鞘上，才首次证明其应为剑鞘上用以佩剑的附件^[3]。20世纪80年代孙机《玉具剑与璫式佩剑法》一文详细讨论了此类器物的称谓及使用方式，并以称“璫”为宜^[4]，今从此说。

自1925年通过科学发掘首次证明玉剑璫的功用，迄今已近百年，玉剑璫在各地偶有出土。经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境内经科学发掘出土或有详细出土地点的玉剑璫约346件，见于全国271处遗址或墓葬，其地域覆盖全国多数省区，年代集中在春秋至魏晋时期。此后虽可见零星的玉剑璫资料，但多为仿古或雅玩所作，故不纳入本文考察范围。这批资料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及相对确切的年代，因此可为分析时空分布的变化与规律提供支撑。本文拟在全面搜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玉剑璫的型式进行分析，并就时空分布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展现玉剑璫的使用图景。

一、型式分析

根据已刊布资料，346件玉剑璫中，残毁严重或资料不全者共37件，其余309件可进行型式分析。

1. 形态

玉剑璫顶面形态差异不大，均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其形态差异主要集中在侧面，根据玉剑璫侧面形态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类（图1）。

A型。14件。器物整体为一上部隆

起的拱形，底部平直，中部为穿孔，顶面与底面长度相同。

标本一，2002年河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XM145出土，器物编号XM145：93。整件器物近长方体，拱形面，中空，孔为圆角长方形，拱形面与两侧面均饰有虺纹。长4、宽2.2、壁厚0.7厘米^[5]。

B型。9件。顶面上端不出檐，与底面一端平齐，下端出檐平直或稍内卷，侧视如P字形。

标本一，1996年河南洛阳唐宫路小学C1M5560出土，编号C1M5560：35。玉质青灰色，俯视呈长方形，长4.5、宽2.1厘米。背为一带有弧度的长方形穿孔，穿孔一边与顶面边缘平齐，顶面另一端出短檐，微向内卷曲。玉璫顶面装饰虺纹^[6]。

C型。23件。顶面呈长方形，向外弧凸，形如桥面。两端出檐较短并微向下弧，但并无卷檐现象，背面正中有长方形的穿孔，因此两侧出檐长度大致相同。此型玉剑璫尺寸大体一致，长度多在4—5厘米之间，尺寸最大者未超过6厘米。

标本一，1959年河南洛阳烧沟汉墓M1039出土，编号M1039：6。青玉质地，顶面外弧，两端出檐顺势下斜，一端雕琢一兽面，主体部分雕琢卷云纹，器长4.5、宽2.3厘米^[7]。

D型。45件。整体呈长条形，上下两端均出檐，上端出檐一般极短且较为平直，下端出檐较长且在末端向内弯卷。

标本一，1994年江苏徐州宛朐侯刘軫墓出土，编号M3：63。剑璫一端略残，大致呈长方形，背有璽，圆角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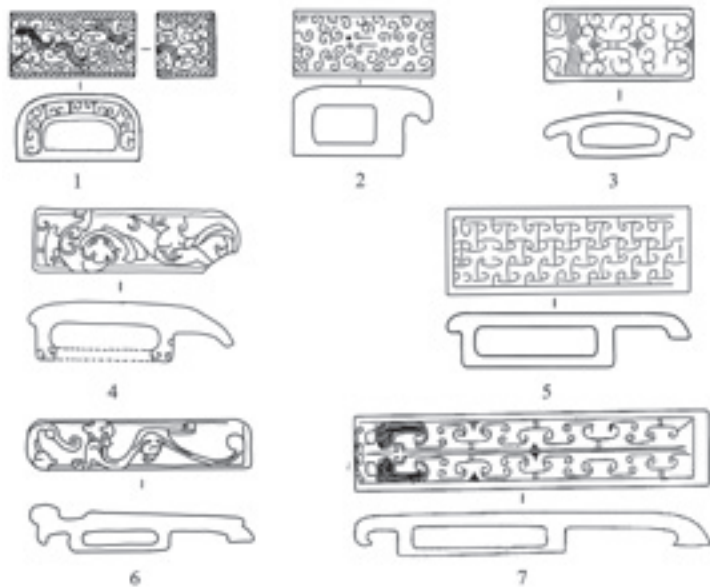


图1 玉剑璫形态

1. A型(河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XM145:93) 2. B型(河南洛阳唐宫路小学C1M5560:35) 3. C型(河南洛阳烧沟汉墓M1039:6) 4. D型(江苏徐州宛朐侯刘軫墓M3:63) 5. D型(湖南长沙风盘岭汉墓M1:16) 6. E型(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M6:24) 7. E型(河南南阳丰泰墓M365:5)

形,两端出檐,下部出檐较短且内收,上部出檐极短。顶面刻一螭虎,虎回首,长尾上卷,双翼张开。长5.55、宽1.65厘米^[8]。

标本二,2008年湖南长沙风盘岭汉墓出土,编号M1:16。剑璲出土时嵌于剑身中部的残存剑鞘中,表面有大片黄斑,平面呈长方形,由外表面和方形内穿孔组成,两端出檐,上端出檐较短且平直,下端出檐较长并内卷。表面饰勾连纹,长5.5、宽1.9、高1.25厘米^[9]。

E型。218件。此型数量最多,整体呈长条形,顶面平直或者略有弧度,两端出檐并向下内收,出檐长度下长上短,穿孔位置偏向一端。

标本一,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M6出土,编号M6:24。玉质白色,局部土沁泛褐色。璲面高浮雕大小两只螭虎,相对作嬉戏状,螭身细部纹饰则用阴线刻。长9.1、宽2.05厘米^[10]。

标本二,2002年河南南阳丰泰墓地M365出土,编号M365:5。玉色乳白,整体为长条状,顶面平直,在两侧出檐末端内卷呈钩状,背面靠上端有一长方形的穿孔。顶面上端阴刻兽面纹,表现出鼻、须、双目、双角等细节,其余部分阴刻卷云纹,沿中部脊线对称分布。长11.6、宽2.4厘米^[11]。

2. 纹饰

玉剑璲置于剑鞘中上部,背面贴附于剑鞘,侧面面积狭小,故而顶面是其装饰重点。除去素面无纹的玉剑璲,可将其顶面纹饰划分为虺纹、谷纹、蒲纹、瓦棱纹、勾连纹、组合兽面纹和神兽纹七类(图2、图3)。

(1) 虺纹

虺纹即由若干小蛇缠绕卷曲组成的

纹饰单元,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极为流行,装饰于铜器或玉器上。但铜器上的虺纹组织较有规律,多呈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玉器上的虺纹排布较为自由,以错置散列为主。1988年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出土的青玉剑璲(M251:356)呈长方体,一端出檐,正面饰虺纹,同出的玉剑饰及其他玉器也多饰以虺纹^[12]。在308件玉剑璲中,饰虺纹者共10件,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最晚一例见于湖南长沙仰天湖战国中期楚墓M25。

(2) 谷纹

谷纹是东周玉器上的虺纹进一步简化抽象的结果,同时摆脱了散乱的组织方式。清一色规律排布的谷纹成为主流的形态^[13]。谷纹装饰的玉剑璲最早见于安徽六安白鹭洲战国中期墓(M585:42),玉璲作拱形,两侧有凹槽,中间阴刻方框,框内减地浅浮雕两排谷纹^[14],此时谷纹排列仍稍显凌乱,并且未完全摆脱虺纹的形态仍保留较长的谷芽。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晚期墓M2出土的谷纹玉剑璲,表面谷纹排列整齐,谷芽明显退化^[15]。当谷纹进一步蜕变失去谷芽,即表现为乳突状。陕西西安投资策划服务公司西汉中期墓M13所出谷纹玉璲,顶面饰5排乳突状的谷纹^[16]。

(3) 蒲纹

蒲纹由三个方向交错的斜线组合而成,因形似蒲席而得名,在玉璧上十分常见,玉剑璲中共见7例。蒲纹斜线组成中空的六边形,其内再雕琢谷纹,其与蒲席的编织纹路乍看相似,但并不是对蒲席的模仿,实际是为了使谷纹排列整齐,在雕琢谷纹前先刻划斜线形成规则的格网。安徽六安双龙机床厂M312出土一件蒲纹玉璲,一端卷檐,面饰蒲纹,蒲纹界格内再雕琢乳突状谷纹^[17]。

(4) 瓦棱纹

瓦棱纹是常见于商周铜器上的一种几何形纹饰,其表现为平行排布的凸棱或凹槽,因形似瓦棱而得名。玉剑璲上的瓦棱纹与之类似,凸棱和凹槽平行于剑璲的长边排列,因形体较窄,一般饰三至五道凸棱,凸棱间的间距不一,但总体沿中线对称分布。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出土瓦棱纹玉剑璲,长5.7、宽1.8厘米,一端卷檐,顶面靠近两侧边缘各有一组竖向瓦棱纹,其余部分均光素无纹^[18]。此种纹饰的玉剑璲共出土11件,年代集中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5) 勾连纹

整齐的浅浮雕谷纹间再以阴刻的细线连接,这种组合纹饰可

称为勾连纹，亦见于玉剑璏的表面装饰。根据阴线连接方式的不同，勾连纹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以阴线连接三颗凸起的谷纹形成纹饰单元，可称为L形勾连纹，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玉剑璏（1：5046）正面阴刻边框线，其内浮雕整齐排列的四排谷纹，再以阴线将三颗谷纹勾连^[19]。另一种勾连纹呈阶梯形，每颗谷纹沿垂直方向引出两条阴线再与邻近的两颗谷纹连接，形成层层递进的形态。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安徽舒城秦家桥西汉早期墓出土的玉剑璏所饰勾连纹即为这一形式^[20-21]。

（6）组合兽面纹

兽面纹在良渚时期的玉器上就已经出现，在商周时期成为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动物纹饰。与良渚玉器和商周铜器上占据主体的兽面纹不同，玉剑璏上的兽面纹不再以单一主体纹饰出现，而是与卷云纹、谷纹、勾连纹等一同构成组合纹饰，可称为兽面卷云纹、兽面谷纹或兽面勾连纹，又以兽面卷云纹为主要形式。本文考察了79例这类纹饰，无一例外兽面位于璏面最上端一隅，其余空间填以卷云纹或谷纹，整体为中轴对称式构图。

战国晚期的长沙枫树山楚墓M34出土的玻璃剑璏上的纹饰可视为兽面组合纹的雏形，在剑璏顶面上端由卷云状阴线勾勒出兽面的双目、眉毛和鼻梁，其余部分饰以阶梯形勾连谷纹^[22]。进入汉代，这种纹饰在玉剑璏中十分流行，此后直至东晋都有实例发现。西安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西汉晚期墓M110出土的玉剑璏，顶面上部为一兽面，圆眼，双眉粗大，末端内卷，其后有三组卷云纹^[23]。

（7）神兽纹

神兽纹是最具时代特色同时也最具艺术表现力的一类纹饰，主要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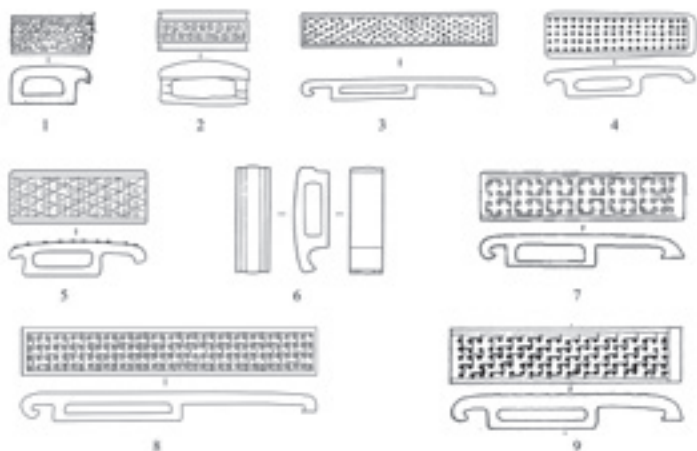


图2 虺纹、谷纹、蒲纹、瓦棱纹、勾连纹玉剑璏

1. 虺纹玉璏（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M251:356） 2. 谷纹玉璏（安徽六安白麟洲战国中期墓M585:42） 3. 谷纹玉璏（山东临淄商王村战国晚期墓M2:49-3） 4. 谷纹玉璏（陕西西安投资策划服务公司西汉中期墓M13:13） 5. 蒲纹玉璏（安徽六安双龙机床厂M312:003） 6. 瓦棱纹玉璏（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103） 7. 勾连纹玉璏（河北满城汉墓1:5046） 8. 勾连纹玉璏（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B1:8） 9. 勾连纹玉璏（安徽舒城秦家桥西汉早期墓M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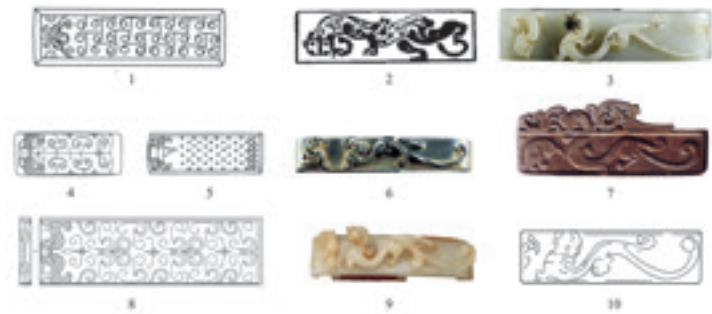


图3 组合兽面纹、神兽纹玉剑璏

1. 兽面勾连谷纹玉璏（湖南长沙枫树山楚墓M34） 2. 虎纹玉剑璏（安徽蚌埠双墩战国晚期墓M3:3） 3. 双螭虎玉剑璏（江西南昌海昏侯墓） 4. 兽面卷云纹玉剑璏（陕西西安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西汉晚期墓M110:23） 5. 兽面谷纹玉剑璏（浙江湖州杨家埠汉墓D23M4:14） 6. 双螭虎玉剑璏（江西南昌海昏侯墓） 7. 神兽纹玉剑璏（陕西汉阳陵司马道北侧陪葬墓M363） 8. 兽面卷云纹玉剑璏（重庆云阳凤箱背M1:134） 9. 龙凤纹玉剑璏（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M40） 10. 龙凤纹玉剑璏（河南洛阳孟津卅里铺东汉墓M1:38）

龙、虎等神兽形象，其中身体修长的类虎神兽在现有资料中常被称为螭虎、螭龙、螭等，在此统称为“神兽纹”。这种纹饰在秦汉时期十分流行，而尤以玉剑璏上的神兽纹最为典型。本文搜集到79件饰有神兽纹的玉剑璏，多数采用高浮雕技法，少数采用浅浮雕或阴刻线刻画神兽，年代自战国晚期一直延续到东晋。

玉剑璏上的神兽纹最初是一只神兽占据璏面的全部空间，蚌埠双墩战国晚期墓M3出土的玉剑璏，正面浅浮雕神兽纹，形似虎，长尾卷曲，呈四足着地匍匐前进状^[24]。自西汉中期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神兽纹图式，这种新图式中，一只形体较大的螭虎占据璏面下部约2/3的空间，上端1/3的空间雕琢一只较小的螭

虎，两者呈对望之态，一些资料将这种纹饰称作子母螭。近年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在主椁室和西回廊中共随葬36件玉剑璏，其中11件为此类高浮雕大小双螭虎相望的纹饰^[25]。一般来说，较大的一只神兽为螭或螭虎当无疑义，而在少数例子中与其组合的神兽却并不固定。汉阳陵司马道北侧陪葬墓M363出土的神兽纹玉剑璏在小兽位置浮雕一只回首张望的小熊^[26]，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M40与河南洛阳孟津卅里铺东汉墓的玉剑璏则在此处雕琢凤鸟^[27-28]。另外，大小双神兽组合纹饰的玉剑璏大多较长，顶面方有足够的空间加刻小兽，而在剑璏较短的例子中，一只神兽便占满了全部空间。

二、时空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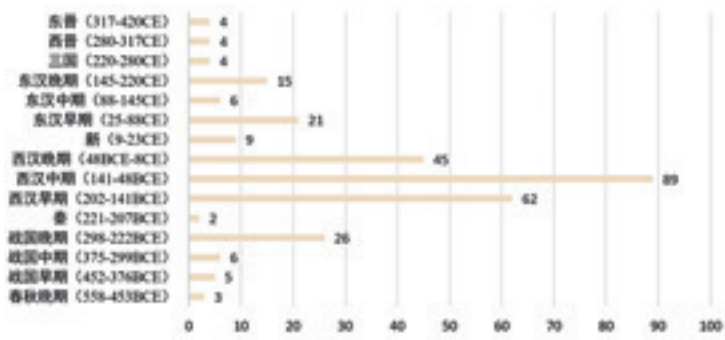
1. 时段划分

本文所搜集347件玉剑璏，年代自春秋晚期延续至东晋，其中301件有相对精确的年代信息，相对较长的时代依据考古惯例划分为早中晚三期，经过对各年代玉剑璏的数量统计得到表1。

依据表1并参照形制与纹饰特点可大致将玉剑璏从出现至消亡的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为萌芽期，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为发展期，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为兴盛期，东汉时期为衰落期，三国两晋为消亡期（表2）。

第一阶段玉剑璏形态较为简单，仅见A、B两型，长度较短，在5厘米以内，除素面外纹饰也比较单一，多为虺

表1 玉剑璏数量统计^①



纹，这种纹饰是春秋晚期玉器上最常见的纹饰，在春秋晚期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和江苏吴国玉器窖藏均有大量此类纹饰的玉器出土。进入战国后，春秋时期的虺纹退化转变为早期形态的谷纹。

自战国晚期开始，玉具剑开始流行，出土的玉剑璏亦随之增多，屈原诗“抚长剑兮玉珥”即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此后直至西汉晚期，玉剑璏一直是贵族佩剑上的常用配饰，这一时期考古出土的玉剑璏占总数的70%以上。玉剑璏的形态在这一时期已经成熟，五种形态均有发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纹饰仍处于发展阶段，谷纹、勾连纹、神兽纹是最常见的纹饰，勾连纹多采用阶梯形连接方式，神兽纹以单只神兽占据璏面空间为主流。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是兴盛期，纹饰亦完全成熟，大小神兽对望的神兽纹新图式出现并流行，兽面组合纹发展成熟，又尤以兽面卷云纹最具特色，L型勾连纹与阶梯形勾连纹并重，蒲纹玉剑璏数量较少，多在这一时期出现。

进入东汉，玉剑璏出现衰落的迹象，不仅出土数量减少，形态与纹饰也不如此前丰富。玉璏有缩短的趋势，表现在D、E两型长度缩减，同时C型剑璏比例增大，长度超过10厘米者极为罕见。兽面卷云纹与神兽纹成为纹饰主流，谷纹与瓦棱纹偶尔出现，勾连纹和蒲纹已无例可寻。三国两晋时期，中国的兵器完成了从剑到刀的兴替，剑已基本退出实战领域^[29]，剑鞘作为附件自然也难以避免走向消亡，近200年间仅有12例继赓余绪，有几件或许还是汉代旧物。兽面卷云纹和神兽纹仍是主要纹饰，在有些例子中纹饰已极为简化，江苏宿迁锅矿山西晋墓的

① 各历史时期的绝对年代，秦汉之后较为确切，东周时期分期断代有多种意见。本文参照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将春秋和战国以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智为界分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春秋三期每期各105年，战国三期每期各76年。考古学研究中的某期通常表示相对年代，此处绝对年代仅供参考。

青玉璚，仅寥寥几道阴线勾勒兽面纹和卷云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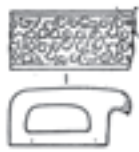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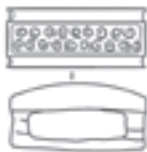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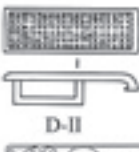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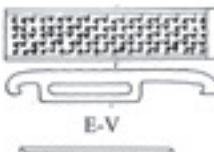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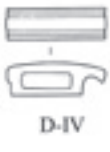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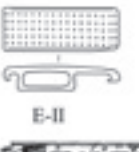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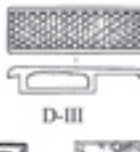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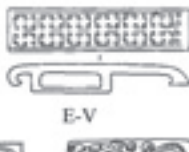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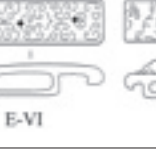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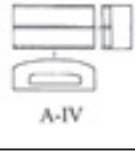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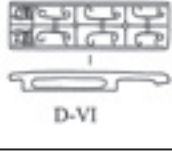
2. 空间格局

本文所搜集的346件玉剑璚，分布于全国271处墓葬或遗址，除广州南越王墓和江西海昏侯墓分别出土13件和36件外，其他各处大多一至三件。这批遗址均具有明确的空间地理信息。综合考虑年代和空间分布，可大致勾画出玉剑璚的出现、传播、消亡的时空轨迹。

玉剑璚最先出现于春秋晚期北方三晋两周地区，山西太原赵卿墓不仅出土了玉璚，还可见到首、格、珌三种玉剑饰，但并未置于同一剑上。至战国中期，在安徽、湖南、河北等地已零散可见玉剑璚的踪迹。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玉剑璚的持续发展和传播阶段，在各国均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还传入了西南巴蜀地区，成都羊子山M172和重庆涪陵小田溪M12、M22的年代都在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后^[18, 30]，且小田溪墓葬的墓主可确定为巴国王室后裔，墓中随葬的铜剑四件玉饰齐备，反映了巴蜀地区随秦人到来而被接纳的新式佩剑礼俗（图4）。另外，在岭南地区玉剑璚与南越国的历史相始终，集中发现于广州附近的西汉早期墓葬内。

进入西汉中期，玉剑璚发展到兴盛期，不仅数量增多，使用的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扩展。此前不见玉剑璚的地区如辽宁、云南、贵州、广西、青海等地，此阶段的墓葬中都有出土。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的滇国高等级墓葬随葬了数件玉剑璚装配的铜剑，其中李家山M51中的一柄铜剑装有玉首、玉璚、玉珌三种玉饰，形制与汉代流行的玉具剑基本一致^[31]。广西合浦、徐闻等地在

表2 各时期玉剑璚代表器形

分期	代表器形		
第一阶段	 B-I	 A-II	 B
第二阶段	 D-II	 E-V	 D-IV
第三阶段	 E-II	 D-III	 E-V
第四阶段	 C-VI	 E-VI	 E-VII
第五阶段	 A-IV	 D-VI	 E-VII

西汉中期设置合浦郡后，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繁荣贸易带来的大量财富在这一地区的汉墓中可见一斑。1990年发掘的合浦黄泥岗1号墓随葬丰富，其中有一件兽面卷云纹玻璃剑璚（图5），所出印章证明墓主为当时的徐闻县令^[32]。在丝绸之路开通后，玉剑璚也向西传播，出现在青海、甘肃等地的墓葬中。

东汉是玉剑璚的衰落期，虽分布范围没有明显缩小，但随着都城迁移，洛阳取代西安成为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汉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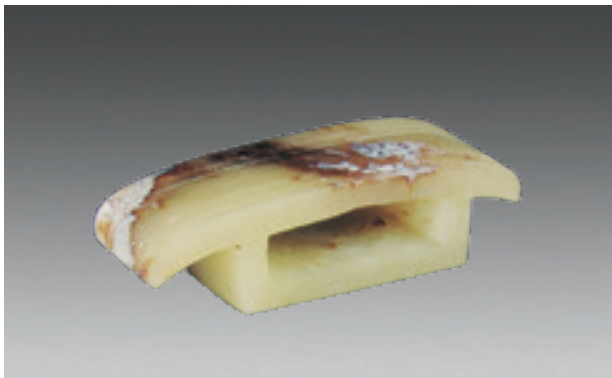


图4 重庆涪陵小田溪M22出土玉剑璏



图5 合浦黄泥岗1号墓出土玻璃剑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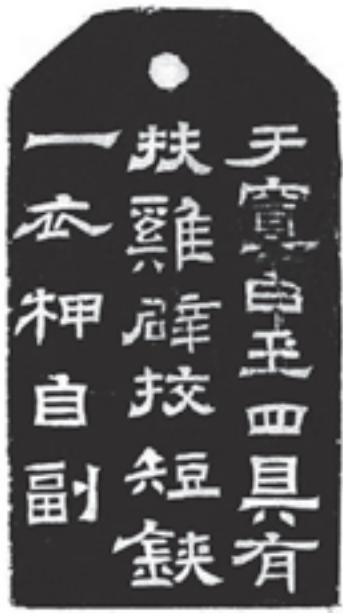


图6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石牌

后，玉剑璏衰亡，出土地点集中在南方长江一线，而在玉剑璏出现最早的北方中原地区已难寻觅，这种分布格局应与汉末以来北方动荡、战乱频繁不无关系。2016年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刻铭佩剑类中有“于闐白玉四具”（图6）^[33]，疑应包括玉剑璏，惜墓葬被盗实物已佚。

3. 域外玉剑璏的发现

玉剑璏这类精美的剑鞘附件不仅在

中国境内广为流行，而且还传入周边地区乃至欧洲（图7）。本文搜集到境外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玉剑璏共18件，其中半数出土于朝鲜平壤汉乐浪故郡遗址的古墓中。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朝鲜半岛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汉朝开始了在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和经略。这一时期大量汉代风格的器物传入朝鲜半岛，玉剑璏亦在其中。1916年朝鲜平壤石岩里9号乐浪汉墓出土两柄铁剑各附一枚玉剑璏，其中一件白玉琢制，长11.9厘米，两端出檐内卷^[3]，属E型，顶面雕琢兽面卷云纹，据同出漆器铭文，其年代为公元11年。另有两件形态、纹饰与此件基本相似的玉剑璏收藏于越南国立博物馆，据传出土于越南北部^[34]，其流传与使用背景应与乐浪汉墓所出相似。

欧洲发现的7件玉剑璏集中于南俄草原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最远一处位于今保加利亚斯塔拉扎格拉地区。1970年在保加利亚发掘的一处公元三四世纪色雷斯贵族墓葬出土一件萨尔马提亚式长剑，剑鞘中部装有一枚玉璏，与中国本土制品几无二致，两端出檐卷曲，顶面高浮雕大小两只相望的螭虎^[35]。不列颠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璏于1894年在今乌克兰库班地区出土，其上浅浮雕兽面卷云纹，兽面部分已磨蚀不清，据推测这件器物于公元一至二世纪在中国制作完成，并在公元三至四世纪被埋藏在萨尔马提亚人的墓葬中^[36]。

在欧洲发现的此类玉剑璏无疑与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有关，但这种交流是通过何种途径或媒介实现的却并不明晰。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匈奴人在公元二世纪到达哈萨克斯坦西部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在欧洲发现的玉剑璏或多或少与匈奴人的到来有关^[37]。特鲁斯戴尔（Trousdale）对此持否定看法，他认为如果是匈奴人将这些物品带到欧洲，那么在匈奴人的墓葬

中至少应该找到实例,但在当时却无此类实例。因此他根据在喀布尔发现的一件贵霜时期的玉剑璏,并考虑到这一地区靠近玉石的产地昆仑山脉,而将古代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视作玉剑璏向欧洲传播的重要一站^[38]。但在1977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末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一件青玉剑璏,器表饰兽面卷云纹,墓中同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证明了墓主的匈奴人身份^[39]。2019年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一座匈奴贵族墓出土一件白玉素面剑璏,测年结果显示墓葬的埋藏年代在公元66—130年之间,这是漠北匈奴故地发现的首例玉剑璏^[40]。这些发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玉剑璏的流传过程中,匈奴人与贵霜人可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玉剑璏是东周至魏晋延续使用的一

种剑上玉质附件,滥觞于春秋晚期,繁盛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末期,进入东汉已呈衰落之态,东汉以降,渐进尾声,只有零星的发现。在玉剑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其形制与纹饰经历了由单一到丰富完善再到退化的过程,其中以两端卷檐长条形的兽面卷云纹和高浮雕神兽纹数量最多,最具时代特色,也成为后世模仿的典型。

玉剑璏最先出现于中原的三晋两周地区,此后不断传播,其分布范围涵盖中国众多省区,在边远地区如云贵、辽南、青海等地也有发现。此外,还远播朝鲜半岛、越南等地,甚至在漠北匈奴腹地以及欧洲都有发现。



图7 域外出土玉剑璏

1. 兽面卷云纹玉剑璏(朝鲜乐浪汉墓出土) 2. 兽面卷云纹玉剑璏(传越南北部出土) 3. 双螭虎玉剑璏(保加利亚斯塔拉扎格拉地区出土) 4. 兽面卷云纹玉剑璏(乌克兰库班地区出土) 5. 素面玉剑璏(传阿富汗出土) 6. 素面玉剑璏(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出土)

参考文献

- [1] 吕大临. 考古图: 卷8: 玉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43.
- [2] 吴大澂. 古玉图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42-145.
- [3] YETTS W P. A Chinese Scabbard—Jade[J].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26(49): 197-201.
- [4] 孙机. 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J]. 考古, 1985(1): 48-60+104.
- [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30-40.
- [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唐宫路小学C1M5560战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4(7): 17-35.
- [7] 洛阳考古发掘队. 洛阳烧沟汉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208+212.
- [8] 徐州博物馆. 徐州西汉宛胸侯刘甄墓[J]. 文物, 1997(2): 4-21+2+1.
- [9]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市望城区文物管理局. 湖南长沙凤盘岭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3(6): 27-38.
- [10] 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J]. 文物, 2001(3): 4-40+91+97+2+1.
- [11] 河南省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南阳丰泰墓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200-201.
-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晋国赵卿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54-156.
- [13] 杨建芳. 龙纹、涡纹、谷纹、蒲纹、乳丁纹: 东周玉器主要纹饰的演变及定名, 兼论《周礼》成书年代[J].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91(22): 87-102.
- [1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六安市文物管理局. 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85的发掘[J]. 考古, 2012(11): 23-32+1+103-108.

- [15] 淄博市博物馆, 齐故城博物馆. 临淄商王墓地[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59-65.
-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投资策划服务公司汉墓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6(4): 10-22+75.
- [1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六安市文物局. 安徽六安城东墓地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652-654.
- [18]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 重庆市文物局.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J]. 文物, 2016(9): 4-27+2+1.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81-83.
- [2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州市博物馆. 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4(9): 4-32+1.
- [2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舒城县文物管理所. 安徽舒城县秦家桥西汉墓[J]. 考古, 1996(10): 33-42+100-102.
- [22]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市博物馆, 等. 长沙楚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345-346.
- [2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 长安汉墓[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592-603.
- [2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蚌埠市博物馆. 安徽蚌埠市双墩三号战国墓[J]. 考古, 2010(9): 18-23.
- [25] 蔡冰清.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剑饰研究[D]. 厦门: 厦门大学, 2018.
- [26] 刘云辉. 陕西出土汉代玉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54.
-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81(8): 1-10+97-98.
- [28]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孟津卅里铺东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6(11): 7-19+1.
- [29] 钟少异. 龙泉霜雪: 古剑的历史和传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73-279.
- [30]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56(4): 1-20.
- [3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溪市文物管理所, 江川县文物局. 江川李家山: 第二次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5-20+211.
- [32] 王伟昭, 蒋廷瑜. 黄泥岗1号墓和“徐闻令印”考[C]//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 2004.
- [33] 李零. 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铭铭文分类考释[J]. 博物院, 2019(5): 6-20.
- [34] JANSE O R 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218-219.
- [35] ÉRIK G, RUSLAN I, ELISABETH S. A Han-dated 'hydra'-type nephrite scabbard slide found in Chatalka (Bulgaria): the earliest and most distant example of Chinese nephrite distribution in Europe[J]. ArkéoLog, 2014, 65: 5-12.
- [36] sword-sheath | British Museum[EB/OL]//The British Museum. [2022-06-05].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H_1923-0716-88.
- [37] 江上波夫. 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 匈奴文化論考[M]. 京都: 全國書房, 1948: 374.
- [38] TROUSDALE W. A Kushan Scabbard Slide from Afghanistan[J].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988: 25-30.
- [3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J]. 文物, 1979(4): 49-53.
- [4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 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2017~2019年考古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 2021(6): 39-53+129.